

論韓愈貶潮時期文章寫作的兩種策略 ——以〈潮州刺史謝上表〉及〈鱷魚文〉 為考察主軸**

姜龍翔*

（收稿日期：99年9月20日；接受刊登日期：99年12月5日）

提 要

韓愈貶潮時期，部分奉承帝王的言論深受後世學者詬病，為釐清韓愈的真正意圖，此文首先藉由詩歌分析韓愈貶潮心態有二，一是悔恨，一是懼死。而在這兩種心理因素的影響之下，韓愈渴望獲赦，並將行動施行於文章之中。於是此文在此前提下，分析韓愈貶潮時期企求帝王開恩的兩種文章寫作策略，一是以正面直接溝通方式，藉由〈潮州刺史謝上表〉等奏表極力誇贊憲宗，並直接向憲宗認錯求情；另外再藉由側面間接宣傳的方式，透過討伐鱷魚這種滑稽動作，以期獲得文章的傳播及注意，並在〈鱷魚文〉中頌揚憲宗功業，建立自己身膺天子之命的忠君形象，與〈潮州刺史謝上表〉呼應，使憲宗確認韓愈忠愛君主的恭維言論實發自內心，從而能夠獲得憲宗的赦免。

** 本論文得以撰成主要受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林晉士教授啟發而成，並感謝兩位審查老師提供寶貴修改意見，特此誌謝。

* 現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候選人暨兼任講師。碩士論文為「莊述祖詩經學之研究」，目前博士論文研究方向為「朱熹詩書義理思想研究」，並曾發表〈郭象莊子序真偽問題續探〉《國文學報》、〈從理一分殊論朱子的經權思想〉《成大中文學報》、〈詩經詁訓疑義探析三則〉《東吳中文學報》、〈向秀本體思想商榷〉《東華人文學報》等計二十餘篇論文。

中國學術年刊 第三十三期（春季號） 民國一〇〇年三月

關鍵詞： 韓愈、〈潮州刺史謝上表〉、〈鱷魚文〉、寫作策略

一、前言

唐憲宗（778-820）元和十四年（819），韓愈（768-824）上〈論佛骨表〉，諫告憲宗勿迎佛骨，觸怒憲宗，幾乎惹來殺身之禍。單純就〈論佛骨表〉而言，韓愈充分展現他率直敢言的本性，表現出堅定的排佛立場，因此受到後世儒者大力推崇，從而確立他在儒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儲欣（1631-約 1706）《韓昌黎文評點注釋》便云：「韓文公以〈諫佛骨表〉窮，亦以〈諫佛骨表〉爭光二曜。」¹韓愈後免死罪，貶放潮州，卻於〈潮州刺史謝上表〉中大力頌揚憲宗，甚至勸其舉行封禪大典，有「導人主以侈心」²之嫌。這兩篇文章前後立場差異過大，而〈潮州刺史謝上表〉歷來評價更是兩極，有以為韓愈於此文中所表現出之乞憐狀，大大削弱諫迎佛骨時的慷慨正氣，如洪邁（1123-1202）即批評：「摧挫獻佞，大與諫表不侔。」³亦有以為韓愈並非乞憐，只是自傷，茅坤（1512-1601）則言：「昌黎遭患憂讒，情哀詞迫。」⁴亦有認為這是人之常情，未足深怪，王若虛（1174-1243）云：「韓退之不善處窮，哀號之語，見於文字，世多譏之。然此亦人之至情，未足深怪。」⁵甚至有以為韓愈雖極力諂上，但這正是忠君的表現，如儲欣又云：「臣子得罪君父，悻悻然自以為是，不復思愆戀闕者，非純臣也。看韓、蘇貶謫後，是何等忠悃。」⁶由此可見，韓愈在貶放潮州前後所表現出來的

¹ 吳文治編：《韓愈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930。

² [清]何焯著，崔高維點校：《義門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卷33，頁595。

³ [宋]洪邁：《容齋隨筆·五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卷9，頁915。

⁴ [明]茅坤編：《唐宋八大家文鈔評文》，收入王水照主編：《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卷1，頁1792。

⁵ [金]王若虛：《滹南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4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29，頁5上。

⁶ 吳文治編：《韓愈資料彙編》，頁930。

態度差異一直受到學者質疑，那麼對於韓愈〈潮州刺史謝上表〉的寫作心態實有再探討的必要。然如欲釐清這個問題，僅局限於〈潮州刺史謝上表〉是不夠的，若將〈謝上表〉獨立來看，其中的言論確與韓愈青年時的觀點及風格表現頗有出入，而〈潮州刺史謝上表〉的特殊性是在貶謫的情況下所寫作，面臨的是生死攸關的時刻，因此反映出來往往是人心脆弱的心理，而這並不會只表現在一篇文章之中，在相同情形下的作品實也會潛藏許多類似的訊息可供查探，因此很難僅憑〈謝上表〉就確認韓愈真正的內心世界，必須通觀韓愈在潮州時期的相關詩文，再審視其具代表性作品，方有理解韓愈真正心態的可能。

韓愈在潮州時遺留下之文章作品並不多，除〈潮州刺史謝上表〉外，最爲著名者便爲〈鱷魚文〉，而兩篇文章皆極具爭議。〈鱷魚文〉以擬人化寫法，先賦予鱷魚睥然不安谿潭的猖狂惡性，然後再大張旗鼓下令鱷魚離開潮州，戲謔筆法，體現出韓愈「奇詭」、「恢奇」的風格特徵。這篇游戲之作歷來也是研究韓文所關注的焦點。韓愈有一類「駁雜無實」⁷、「以文爲戲」⁸的文學作品，雖然張籍、裴度等人並非用以指稱〈鱷魚文〉，但〈鱷魚文〉的內容性質，其實亦頗符合這種風格，故一般均認爲此文與〈毛穎傳〉、〈送窮文〉等均可爲韓愈游戲文學的代表作。然〈鱷魚文〉又有被認爲是韓愈爲民除害，或暗寓諷刺之作，但〈鱷魚文〉通篇卻一再強調自己乃承天子之命討伐鱷魚，從文章表面意思來看諷刺意味似有不足；而若純爲驅鱷以安民居，爲何卻以極不莊重的戲謔筆法爲之？且這些觀點的提出與韓愈貶潮所表現出來的心態是否吻合？皆不無疑問。因此，本文試圖另闢新途，將〈鱷魚文〉與〈潮州刺

⁷ 張籍（768-830）〈與韓愈書〉便云：「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爲歡，此有以累於令德。」見〔唐〕張籍：《張司業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4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8，頁2下。

⁸ 裴度（765-839）〈寄李翱書〉亦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爲戲，可矣乎？可矣乎？」見〔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68年），卷680，頁11上。

史謝上表〉合併探討，以韓愈貶潮的心理為基礎，重新詮釋〈鱷魚文〉的寫作意圖，並由此分析韓愈在潮州時期以〈潮州刺史謝上表〉為主的文章寫作策略。

二、韓愈貶潮心理分析

韓愈一生共經歷兩次貶謫，第一次貶於陽山，第二次貶於潮州，對他而言，韓愈對第二次貶放潮州更感刻骨銘心。元和十二年（817），憲宗平定淮西吳元濟（783-817），唐朝頗有中興氣象。韓愈因參與此次戰役，官祿名位也扶搖直上，但卻以迎佛折壽為論點，上表勸諫憲宗切勿迎佛骨，故而惹惱憲宗。對韓愈而言，這次貶謫實是弄巧成拙，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他原本以為在頗受重用的當下，自己的一番諫言多少能夠影響憲宗，但事與願違，反而差點惹來殺身之禍。韓愈被下令立即啓程，家人也被迫離京，十二歲幼女女挈不幸死於途中，韓愈當時無法親斂其骨，須待至四年後方得歸葬故鄉，〈祭女挈女文〉便哀嘆其女：「死于窮山，實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使汝至此，豈不緣我？」⁹ 韓愈不只在前途上受到重大打擊，家庭更因此崩離，由人生的高峰瞬時落入低潮，對韓愈而言，必然是悔恨莫及，〈宿曾江口示姪孫湘二首〉云：「嗟我亦拙謀，致身落南蠻。茫然失所詣，無路何能還？」¹⁰ 〈瀧吏〉則云：「官不自謹慎，宜即引分往。……官何不自量，滿溢以取斯。」¹¹ 韓愈深自檢討召禍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滿溢，一是拙謀，而這兩者也有連帶關係。韓愈因參與平定淮西之役，擢刑部侍郎，深受憲宗信賴，韓愈此時頗有得君行道之悅，對於自己的功勞也相當滿意，因此在得知

⁹ 〔唐〕韓愈撰，〔清〕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臺北：世界書局，民國61年），頁200。

¹⁰ 〔唐〕韓愈著：《韓昌黎全集》（上海：世界書局，民國24年），卷6，頁106。

¹¹ 同前註，頁104。

憲宗欲迎佛骨之際，便貿然進諫，此為滿溢之表現；拙謀則是指〈論佛骨表〉中諫辭使用之不當，觸犯帝王大忌。《舊唐書·韓愈傳》載憲宗發怒主因在於：「謂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刺也！愈為人臣，敢爾狂妄，固不可赦。」¹²韓愈以後代信佛帝王壽命皆短促為論點，雖意在勸戒憲宗，但言例不當，適得其反，〈潮州刺史謝上表〉便云：「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¹³不敬之言辭，不但未收到勸諫之效，反而以乖刺言論激怒帝王，使自己遭受無妄之災。也由於此，韓愈自己確實是具有罪臣意識的，〈食曲河驛〉云：「而我抱重罪，孑孑萬里程。」¹⁴〈武關西逢配流吐蕃〉云：「我今罪重無歸望，直去長安路八千。」¹⁵韓愈深切體認到自己在〈論佛骨表〉中的言論過於不敬，冒犯帝王，在經歷生死關頭之後，對自己的衝動言論必然是深自省切。後世研究韓愈散文風格者一般認為，貶潮之後韓愈的文章鋒稜較為收斂，王基倫即認為韓愈貶潮後立言更為謹慎，其云：「隨著境遇心情的轉變，詩文風格又漸趨平緩，對社會黑暗面的批判逐漸減弱。於是立言趨於謹慎，語氣平緩許多。」¹⁶除了貶謫的可怕經歷造成他文風轉變之外，韓愈對於自己無端以文辭自招禍患必然也會深切反省，反映在文辭上，便是下筆更趨仔細，立論更為嚴謹。

除深刻悔意外，韓愈對於自己所遭受到的逐臣命運，並非以超然心境面對，而是充滿憂慮，深怕自己無法度過此一劫厄。潮州在唐代時乃是一邊疆未開化之地，韓愈於〈瀧吏〉詩形容此處為「惡溪瘴毒聚，雷電常洶洶。鱷魚大於船，牙眼怖殺儂。州南數十里，有海無天地。颶風

¹²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7年《百衲本廿四史》影印宋紹興刊本），傳卷110，頁1205。

¹³ 〔唐〕韓愈撰，〔清〕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頁357。

¹⁴ 〔唐〕韓愈著：《韓昌黎全集》，卷6，頁103。

¹⁵ 同前註，卷10，頁164。

¹⁶ 王基倫：〈韓愈散文分期意義之探討〉，《漢學研究集刊》第1期（2005年12月），頁64。

有時作，掀簸真差事。」¹⁷韓愈這次貶謫和初貶陽山的情況不同，此次乃得罪國家最高權力者，帝王手掌生殺大權，被貶謫已是開恩下的結果，就現實的情況而言，韓愈的心情可說是相當絕望的，〈過南陽〉云：「孰忍生以感，吾將寄餘齡。」¹⁸韓愈很擔心自己從此不得再召回朝，故有寄其餘生的感慨。〈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又云：「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¹⁹唐代常有所謂「追賜死」的制度，而在藍田驛遭賜死的文人甚多，²⁰因此，韓愈特於藍田寫詩詠懷，其實內心惶恐戰慄，非常害怕自己真會葬身異鄉。但他又絕不願自己就這樣死去，〈食曲河驛〉云：「下負明義重，上孤朝命榮。殺身諒無補，何用答生成。」²¹就現實層面來看，獲赦是可遇不可求的際遇，雖然擔憂可能會終老於此，但韓愈內心深處仍然渴望能得到帝王的赦免，〈路傍堠〉便云：「吾君勤聽治，照與日月敵。臣愚幸可哀，臣罪庶可釋。何當迎送歸，緣路高歷歷。」²²韓愈透過詩歌抒發自己仍對帝王的施恩懷抱一絲期望，希冀憲宗能憐憫韓愈之哀苦愚昧，早日迎納回朝。〈次鄧州界〉又云：「早晚王師收海嶽，普將雷雨發萌芽。」²³海嶽乃指郾部之寇，而雷雨發芽乃化用《易·解》之象辭：「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韓愈除期望憲宗能對直接對他開赦外，亦期盼能藉由其他管道獲得赦免機會。〈祭湘君夫人〉云：「愈以罪犯黜守潮州，懼以譴死，且虞海山

¹⁷ 〔唐〕韓愈著：《韓昌黎全集》，卷6，頁103-104。

¹⁸ 同前註，頁103。

¹⁹ 同前註，卷10，頁163。

²⁰ 據《舊唐書》所載，罪臣流放遭賜死於藍田驛者頗多，如〈玄宗本紀〉載：「太子妃兄，駙馬都尉薛鏞，長流灋州，至藍田驛，賜死。」〈代宗本紀〉載：「襄州刺史裴義，長流費州，賜死於藍田驛。」〈黎幹傳〉則載黎幹與劉忠翼被詔長流在外：「既行，市里兒童數千人譟聚，懷瓦礫投擊之，捕賊尉不能止，遂皆死於藍田驛。」〈王仁皎傳〉則載王守一「左遷柳州司馬，行至藍田驛，賜死。」

²¹ 〔唐〕韓愈著：《韓昌黎全集》，卷6，頁103。

²² 同前註。

²³ 同前註，卷10，頁164。

之波霧瘴毒為災以殞其命，舟次祠下，是用有禱于神。神享其衷賜以吉卜，曰如汝志。」²⁴人窮則呼天，死亡陰影籠罩下的韓愈，求神時的願望便是早日獲赦以遠離此地。由此可見，在韓愈的潛意識中，他最大的期許便是能夠獲得赦免，最好當然是皇帝點名直接赦免其過，召喚回朝。但如果是憑藉其他大赦天下的機會而蒙霽聖恩也為韓愈可接受的方式。無論何種情況，只要有恩赦機會，他都寄託期望在其中。但韓愈也非束手無策，靜待天命安排，他其實設計不少動作為自己的處境一搏，王基倫即認為韓愈在潮州、袁州時期的大量上表，目的便在祈求帝王恩赦：

後期貶潮州是另一次嚴重的打擊，雖然抱怨潮州的詩文較少，但從他到潮州後大量上表朝廷看來，此事非同小可。……也與他在被貶潮州後，擔心此後一無死所，於是屢屢上表，乞求恩赦有關。²⁵

韓愈上達憲宗之表有〈潮州刺史謝上表〉、〈賀冊尊號表〉，憲宗於元和十五年（820）駕崩，穆宗（795-824）繼位，韓愈更連續上了〈袁州刺史謝上表〉、〈賀赦表〉、〈賀冊皇太后表〉、〈賀慶雲表〉等表，閻琦認為韓愈本為穆宗東宮舊僚，因此他意圖「要喚起穆宗對自己的注意，欲回歸長安的急切心情溢於言表。」²⁶上表乃直接與帝王對話的途徑，大量的奏表便顯示出韓愈亟引起帝王注意的心態。

綜合上述分析，韓愈貶謫潮州之後的心境大致有二，一是悔恨自己在〈論佛骨表〉中言論太過激烈，因而招禍，這是對自己的反省，反映在文字上便是日後遣詞用字的更趨謹慎；一是憂慮潮州環境險惡，唯恐

²⁴ [唐]韓愈撰，[清]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頁188。

²⁵ 王基倫：〈韓愈散文分期意義之探討〉，頁61。

²⁶ 閻琦：〈元和末年韓愈與佛教關係之探討〉，《蘇州鐵道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4卷第3期（1997年6月），頁51。

死於異鄉，故期盼能得帝王赦免，反映在文字上則是哀求語氣及頌美言辭的大量增加。結合這兩種心境，韓愈是不願毫無作為，只寄寓希望在不可知的狀況中，他不容許自己就這樣長待在潮州，〈答柳柳州食蝦蟆〉云：「常懼染蠻夷，失平生好樂。而君復何為，甘食比參豹？」²⁷韓愈仍是以「蠻夷」、「南蠻」這些鄙夷的名詞稱呼潮州，這與韓愈排斥佛教乃夷狄之法相同，在其意識深處，他是看不起這些邊疆地區的。因此大概也不曾產生過欲融入當地的想法，〈量移袁州張韶州端公以詩相賀因酬之〉云：「北望詎令隨塞鴈，南遷纔免葬江魚。」²⁸可見北向的願望即使在量移之後仍絲毫未減。從這個角度來看韓愈在潮州時所寫的文章，便會發現，韓愈運用許多技巧策略，希望透過他唯一能對外溝通的文筆工具，利用文章取得與憲宗的聯繫，說服憲宗進而改變他在〈論佛骨表〉中所犯下的錯誤。

三、〈潮州刺史謝上表〉的直接溝通策略

傳統文人對待詩文的態度不同，詩歌多投射出詩人真實心境及情感，因此吾人欲探討韓愈內心世界，必須以詩歌為主，再觀照文章。而文章的創作目的實有其特殊性質，文人寫作文章，特別講究謀篇布局，用字必須斟酌，尤其唐人文章多數用於交際目的，兵界勇《唐代散文演變關鍵之研究》便云：

在唐代文人的社會生活中，應酬文字幾乎無所不及，無可或缺：表敬慕、達思念，則有書啟；敘歡宴，送遠遊，則有宴集序和贈行序；弔喪祭，記墳墓，則有哀祭文和墓誌銘；祈神靈，則有祝

²⁷ [唐]韓愈著：《韓昌黎全集》，卷6，頁107。

²⁸ 同前註，卷10，頁165。

文；誌事功，則有碑記；慶落成，則有亭臺記；序詩文，則有詩文集序……，凡此在在需要運用應酬文字，應酬文字因此成為唐代文學寫作活動中數量最多的作品，作者往往連篇連牘，積案盈箱。²⁹

這種應酬目的一方面除藉由文字連絡情感外，更可以將自己的意圖暗藏在文章之中，韓愈尤其是這方面的寫作高手，如〈送董邵南序〉便暗諷河北藩鎮不服中央，〈送高閑上人序〉、〈送浮屠文暢師序〉及〈送廖道士序〉則顯露出對佛老的不滿，〈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及〈送石處士序〉亦表達對節度使的不信任，因此韓愈是非常熟悉利用文章以達到交際應用的效果，而這也是他的專長。那麼韓愈現在以罪臣身分遠處邊疆地域，一心期望帝王恩赦，但能與帝王直接對話的媒介只剩下公文書函，一般文章很難傳達至憲宗眼前，因此韓愈不得不設計一些策略，希望透過不同的方式及效果，以文字作為宣傳工具，而第一步便是在〈潮州刺史謝上表〉中傳達對帝王敬仰及悔恨之意，以期感動憲宗。但僅憑一紙謝表就想達成目的，韓愈自己大概也不敢如此自信，於是他又寫作〈鱷魚文〉，企圖利用此文的傳播效果，與憲宗再取得連繫，並印證〈潮州刺史謝上表〉的說辭。

歷代學者對韓愈的質疑在於〈潮州刺史謝上表〉過度阿諛奉承，有損韓愈在〈論佛骨表〉中所表現出的正直氣概，《黃氏日抄》便云：

〈論佛骨表〉之說正矣，〈潮州謝表〉稱頌功德之不暇，直勸東巡泰山而自任鋪張，雖古人不多讓。甚矣，憲宗之不可與忠言，而公也汲汲乎苟全性命，兩可悲矣夫。³⁰

²⁹ 兵界勇：《唐代散文演變關鍵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94年），頁159。

³⁰ 〔宋〕黃震：《黃氏日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74年《景印文淵閣四庫

但須注意的是，韓愈在〈論佛骨表〉中明確排擠佛教，若因受貶潮州而改變對待佛教的態度，以企圖求生，那麼便是大節有虧；但若所奉承者僅為帝王，那麼韓愈則是純為諛帝以圖赦免。而且就算是諛帝，也必須分別韓愈在貶潮前後對待帝王態度是否有所不同，亦即若韓愈在獲罪之前，從不輕易阿諛帝王，一切靦顏哀求的行為乃在貶謫潮州之後才出現，那麼韓愈便是違背自己本來的立場，以此詬疵也無可厚非。但若韓愈對憲宗本就秉持一貫稱揚讚頌的態度，那麼〈潮州刺史謝上表〉的諛帝言論不過是延續這種態度，則諛帝便是韓愈的固有行為，不需因〈潮州刺史謝上表〉的奉承言論而太過苛責。況且，歷代被貶逐者之謝表，大多不脫奉承謝罪之內容，吾人亦不必以過高道德標準對待韓愈。那麼韓愈對憲宗的態度究竟為何？考察韓愈自憲宗即位之來所表現出來對帝王的態度，可以發現，韓愈並不是在貶逐潮州之後才開始對憲宗進行歌頌。早年韓愈謫貶陽山，他高度懷疑這是王叔文（735-806）黨背地裡的傑作，因此對於政爭的歸屬，他便傾向於憲宗一黨，〈永貞行〉即歌頌憲宗云：「嗣皇卓犖信英主，文如太宗武高祖。」³¹元和初年的〈元和聖德詩〉更對憲宗平定楊惠琳與劉闢的功績進行大力稱揚，其中有道：「皇帝神聖，通達今古，聽聰視明，一似堯禹。生知法式，動得理所。」³²元和四年〈與少室李拾遺書〉又稱頌憲宗云：「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以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³³元和十三年〈平淮西碑〉更是以憲宗功業為基礎論點而寫成。從這些詩文來看，韓愈尊崇憲宗的言辭始終如一，或許貶謫後的諛帝言論更多出其他不同目的，但其實並不違背自己之前一貫的尊君

全書》），卷 59，頁 41 下。。

³¹ 〔唐〕韓愈著：《韓昌黎全集》，卷 3，頁 54。

³² 同前註，卷 1，頁 10-11。

³³ 〔唐〕韓愈撰，〔清〕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外集卷上，頁 386。

的立場。

儒者對三代聖王極度崇拜，而這種心態往往會轉移至當今帝王，形成所謂得君行道的政治期望。綜觀韓愈獲罪貶潮之前，他對憲宗確實充滿敬仰的崇拜心理。憲宗一朝是中唐之後較為強盛的時代，大有復興唐室的可能，韓愈不滿藩鎮割據局勢的混亂，對於憲宗自然會投注相當期望。〈論佛骨表〉正是出於這種呼籲帝王能秉持正統先王之道，勿迷信異端的心理而提出，那麼〈潮州刺史謝上表〉對憲宗所進行的稱頌，便非違心之論，不必以此揶揄韓愈過度奉承帝王。當然，韓愈此時的諛帝行爲更增添一種期盼帝王赦免的心理，因此，稱韓愈搖尾帖首其實也不爲過。而從前節的論述可知，韓愈亟欲透過各種可能的管道獲赦，但與其寄託於不可求的機會，倒不如由自己主導掌握，因此，他當是深以「拙謀」爲戒的，〈潮州祭神文〉其一云：「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³⁴可見韓愈正處心設計謝上表的內容，這絕非簡單地謝恩告罪而已，必須暗藏特殊策略，當然，絕不能再重蹈〈論佛骨表〉誤犯帝王大忌的覆轍，因此韓愈一改強勢性格，放低姿態。分析韓愈〈潮州刺史謝上表〉的寫作內容，約可分爲三個步驟，首先向憲宗直接低頭認錯，並指出自己的錯誤在於「言涉不敬」，韓愈更用逆筆之法，將貶刺潮州視爲憲宗對他開恩的作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³⁵憲宗原本欲置韓愈死地，但韓愈反其言而美之，對憲宗貶斥的決定視爲皇帝仁心的表現，一方面認錯，一方面又感激皇帝的開恩。接著，韓愈又用哀兵之策，向憲宗訴說潮州地理環境之險惡，冀望憲宗能發惻隱之心，〈潮州刺史謝上表〉云：

³⁴ 同前註，頁 185。

³⁵ 同前註，頁 357。

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鰐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為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³⁶

韓愈得以免死，裴度（765-839）、崔群（772-832）用力甚深，韓愈不可能不知，但卻說「誰肯為臣言者」，其目的仍在於將一切事跡全歸美於帝王。然歷代謫臣謝表寫法其實亦多不出此種認錯、謝恩的內容，帝王手掌罪臣生殺大權，稍一不慎，便可能再加處罰，甚至賠上性命，因此，對皇帝的恭維是謝表中必不可缺的內容，而韓愈〈潮州刺史謝上表〉認錯、訴苦、歸美的三部曲，其實並未脫出歷代謝表的寫作型式，如元稹（779-831）〈同州刺史謝上表〉言「臣某辜負聖朝，辱累恩獎，便合自求死所，豈宜尚忝官榮？臣稹誠恐誠慚，死罪死罪。」亦以認錯為先，再動之以情：「臣八歲喪父，家貧無業，母兄乞丐以供資養，衣不布體，食不充腸。」強調自己值得同情的地方，最後並以歸美帝王為同調，「不料姦人疑臣殺害裴度，妄有告論，塵黷聖聰，愧羞天地。臣本待辨明亦了，便擬殺身謝責，豈料聖慈尚在，薄貶同州。雖違咫尺之顏，不遠郊畿之境，伏料必是宸衷獨斷，乞臣此官。」³⁷大概這些都是謫臣謝恩時不可免的客套之語。

不過韓愈〈潮州刺史謝上表〉最大的爭議便在於他極力推薦憲宗施行封禪大典，並以為其功在高祖、太宗之上。韓愈在〈潮州刺史謝上表〉中所提出東巡封禪的建議，除明褒憲宗外，實際也暗藏解決自己處境的方法，〈潮州刺史謝上表〉有云：

³⁶ 同前註，頁 357-358。

³⁷ 〔唐〕元稹：《元稹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 33，頁 383-384。

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裡，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閔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³⁸

封禪大典必須有祭告天地之祝文，《史記·封禪書》便云：「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³⁹此玉牒書乃紀成功之文，韓愈強調自己「為時輩所見推許」的文書寫作才華，⁴⁰並自詡稱頌憲宗的文字可以編之《詩》、《書》而無愧。這些自我推重的言論，除了反映韓愈早期強烈自我意識的寫作風格外，更深刻的目的在於向憲宗自我推薦，企圖喚回憲宗對他文筆才能的重視，因此封禪大典只是韓愈設計給憲宗的一個藉口，明人蔣之翹（1596-1659）感嘆韓愈「以封禪之事啓主上好大喜功之心。」⁴¹然而這正是韓愈樂見的。後世儒者對憲宗是否具備封禪的資格頗有微辭，然此乃後人蓋棺之論，韓愈身處憲宗中興之朝，眼見帝王確有平定藩鎮的功績，加上企圖藉此典禮而獲恩赦的期盼，故而大膽建議憲宗封禪，〈潮州刺史謝上表〉又云：

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疊，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⁴²

姑且不論韓愈自身是否認為憲宗夠資格封禪，但他確實是企望藉由封禪

³⁸ [唐]韓愈撰，[清]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頁358。

³⁹ [漢]司馬遷：《史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百衲本廿四史》影印宋慶元黃善夫刊本），卷12，頁175。

⁴⁰ 如李商隱便極為推重〈平淮西碑〉，其〈韓碑〉詩更以「古者世稱大手筆」譽之。

⁴¹ 羅聯添編：《韓愈古文校注彙輯》（臺北：國立編譯館，民國92年），頁3255。

⁴² [唐]韓愈撰，[清]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頁358。

之典而獲召回朝。韓愈雖為一介文官，然其文筆才華乃居當代執牛耳地位，韓愈常為人寫作墓誌銘，並曾受詔撰寫〈平淮西碑〉及編修敏感的《順宗實錄》，韓愈的這些文書能力必也為憲宗重視，元和十二年，韓愈即受命任知制誥，專門負責起草詔命，等於是皇帝的文書代言人。因此韓愈在此感嘆不得奏薄伎，即是希望憲宗要重視他的能力，在封禪典禮上貢獻自己的才能，為皇帝起草典禮相關文書，可以說，這是韓愈出於自我設計欲給憲宗下的一步指導棋，而這也是韓愈建議憲宗封禪的真正目的。

元和十四年群臣為唐憲宗上尊號，《舊唐書·憲宗紀》載：「群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是日御宣政殿，受冊，禮畢，御丹鳳樓，大赦天下。」⁴³韓愈大概同步便得知將大赦天下的消息，但詳細赦免情節尚未出爐，韓愈便迫不及待又上了〈賀冊尊號表〉，在這封賀表中，韓愈又重提封禪之事，「方當議明堂、辟雍之事，撰泰山、梁父之儀，搜三代之逸禮，補百王之漏典，時乘六龍，肆覲東后。」⁴⁴這完全呼應了〈潮州刺史謝上表〉的內容，證明韓愈確實不是隨口說說而已。憲宗因受尊號而大赦天下，但韓愈大概知道赦免的幅度不會太大，於是重提建議，希望利用這錦上添花的作為，使憲宗重新評估封禪之事，然韓愈最大的期盼則是能夠直接被召回京師。韓愈這些苦心作為，確實也得到憲宗的回應，《舊唐書·韓愈傳》載：

憲宗謂宰臣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為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为是惡其容易。」上欲復用愈，故先語。及觀宰臣之奏對，而皇甫鏗惡愈狷直，恐其復用，率先對曰：「愈終大狂疎，且可量移一

⁴³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憲宗下》，卷15，頁1520。

⁴⁴ 〔唐〕韓愈撰，〔清〕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頁359。

郡。」乃授袁州刺史。⁴⁵

從這段記載來看，〈潮州刺史謝上表〉確實已達成部分目的，代表韓愈諛帝的行爲是成功的，雖然未能直接返回京師，但得量移便是不錯的結果。前面也提過，韓愈渴望獲赦的心情極度強烈，因此在寫作〈謝上表〉之初，自然不會將所有希望孤注一擲，且欲仰賴一篇文章便能感動帝王，仍有所不足，在這樣的狀況下，韓愈又構思〈鱷魚文〉一文，企圖由側面宣傳繼續加強說服憲宗的效果。

四、〈鱷魚文〉的側面加強效果

〈潮州刺史謝上表〉是韓愈企求憲宗諒解的正面作法，韓愈以待罪之身遠處外地，謝表是直接與皇帝溝通的文字，韓愈雖極盡所能頌揚憲宗，但敬仰憲宗本是韓愈一貫的態度，因此諛帝的成份雖多，但不代表韓愈尊君的立場有變，只是多了一種祈求帝王開恩的不純企圖。但韓愈尋求憲宗諒解的策略不僅表現在〈潮州刺史謝上表〉中，他其實更試圖從其他管道影響帝王視聽，以期能令憲宗釋懷。除〈潮州刺史謝上表〉外，〈鱷魚文〉的寫成其實也必須視爲韓愈企圖上達天聽的策略之一。韓愈潮州任內最爲人津津樂道的文章乃〈鱷魚文〉，當時潮州深受鱷魚爲害所苦，韓愈到任之後即大張旗鼓欲討伐鱷魚，消除民患，而〈鱷魚文〉則是韓愈在剿殺鱷魚之前所下的戰帖。〈鱷魚文〉又名〈祭鱷魚文〉，性質雖似祭文，但內容卻似檄文。⁴⁶歷來學者對此文評價甚高，有以爲

⁴⁵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韓愈列傳》，列傳卷110，頁1206。

⁴⁶ 關於〈鱷魚文〉的文體性質，歷來爭議頗多，單就名義而言，此文真正篇名究竟為何？歷來也是聚訟紛紜，宋·黃仲炎《春秋通說》稱「韓愈氏驅鱷魚文」，《方輿覽勝》雜文類著錄為「韓愈祭鱷魚文」宋·洪邁《容齋隨筆》：「韓文公傳全載其進學解、諫佛骨表、潮州謝上表、祝鱷魚文」，石介〈擊蛇笏銘〉云：「在唐爲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黃庭堅《山谷集·朝請郎郭方進墓誌銘》云：「韓潮

此乃韓愈愛民之作，並認為此文具浩然之氣，足以悚懾百靈；⁴⁷亦有以爲韓愈此文乃奉天討罪，欲藉此文諷刺藩鎮跋扈，周應龍《文髓》便云：

公刺潮州鱷魚，在界內侵害百姓，豈容不問。方是時藩鎮跋扈，強臣悍將遍天下，此皆投畀豺虎，豺虎不食者，尚肯聽其言哉？所以公於此文言天子者凡五，蓋言其受天子命來潮州，不得不與鱷魚討分曉，雖告諭虫魚，尚托之天子，非特可以見公之知有君父，亦庶幾大義所在，可以感動鱷魚之知有公也。⁴⁸

今人宋廓亦認為諷刺藩鎮是本文寫作意圖，其云：

在指責鱷魚的背後，我們應該看到有比鱷魚更為兇殘的醜類在。安史之亂以來那些擁兵割據的藩鎮大帥，魚肉百姓的貪官污吏，不是更為禍國殃民嗎？所以這篇貌似「遊戲文字」的文章，顯然寓有鮮明的主題，它因小見大，發人深思，有著嚴峻的現實意義。⁴⁹

而楊子怡則提出從文化學及社會學的角度來觀察，他認為潮州百姓本就有殺牲祭鱷的行爲，而韓愈〈鱷魚文〉的寫作是出於穩定百姓情緒，消除恐懼心理，迎合地方風俗的作法，他並以爲韓愈一直以天子命吏身分命令鱷魚，是說給百姓聽的，其云：

州移鱷魚文」，阮閱《詩話總龜》則稱為：「韓文公遣鱷魚文」。

47 如石介〈擊蛇笏銘〉論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表現為：「在堯時為指佞草，在魯為孔子誅少正卯刃，在齊為太史簡，在晉為董狐筆；在漢武朝為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為朱雲劍；在東漢為張綱輪；在唐為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為段太尉擊朱泚笏。」見〔宋〕石介：《徂徠石先生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6，頁72

48 羅聯添編：《韓愈古文校注彙輯》，頁3002。

49 陳振鵬、章培恆編：《古文鑒賞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1年），頁992。

這是說給老百姓聽的，其認真的態度也是做給百姓看的，讓百姓相信，刺史是有辦法消弭鱷患的。作為父母官的他，深知百姓的期盼心理，深知自己的一言一行會對百姓的心理預期產生影響。可見，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而言，韓愈充分掌握了百姓心理，他知道這種形式是不能趕走鱷魚，但如能穩定百姓情緒，消弭恐懼心理，那已經是成功了一半。⁵⁰

這些對〈鱷魚文〉寫作意圖的推論，均極度美化韓愈的寫作目的。韓愈確實厭惡藩鎮亂唐，但以鱷魚譬之，比類頗不適當。而以韓愈祭告鱷魚為掌握百姓心理的做法，雖說是掌握民心的一種作法，但問題在於韓愈是用「以文為戲」的戲謔筆法寫作此文，這與傳統講究莊重典雅的祝文風格不同，這樣的文章，難道就可以得百姓之心？林雲銘（1628-1697）《古文析義》便言：「在昌黎作此文時，豈能料其必徙？萬一不徙，等之兒戲耳！」⁵¹鱷魚不徙乃意料中結果，若韓愈真想以一篇近乎遊戲式的祭文收攏人心，未免異想天開。而最重要的癥結在於這些寫作意圖的推測與韓愈當時貶斥潮州的心境並不符合，潮州的韓愈是畏死的，他一心只想早日離開潮州，在這種心態的趨使下，韓愈一些超乎尋常的作為便必須扣住這種心理來解釋。

韓愈雖以罪人身分貶逐潮州，但名義上仍是一州刺史，就通常情況來說，州縣長官在到職時往往會先祭拜地方神靈，但韓愈初到潮州卻一反常規，自己不出席祭典，派人代祭，其中原因韓愈於〈潮州祭神文〉第一首有云：

愈承朝命，為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

⁵⁰ 楊子怡：《韓愈刺潮與蘇軾寓惠比較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頁124。

⁵¹ 羅聯添編：《韓愈古文校注彙輯》，頁3004。

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糈酒食器皿掬弊，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自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告。⁵²

韓愈初到潮州，竟不優先祭祀地方神靈，而以「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作為藉口，為何不能專一？韓愈大概正設法該如何才能取得憲宗的赦免，但豈會因為如此便無暇參加祭祀，可見這應該只是韓愈的藉口。因此，與其如楊子怡認為韓愈欲掌握百姓心理，但不如從韓愈自己的心理狀態來理解。前文已透過韓愈貶潮時相關詩文看出，韓愈最憂心的事情便是客死潮州，他內心無時無刻不在期盼獲得憲宗的開赦，這種情緒在抵達潮州後，應該會達到最高峰，因此他立刻迴避刺史原本該舉行的祭典，但這並不是韓愈鬧脾氣的行為，而是企圖藉由文章傳播的功能，與遠在京城之憲宗取得溝通的管道，他是為了上奏天子而不能祭神，反常的行為，是為了強調他內心極為重視天子，並且企圖藉由誠心悔過的形象，冀為憲宗聽聞而稍解上意。

明白韓愈渴望得赦的心情後，再來閱讀〈鱷魚文〉，便可發現其中暗藏許多訊息。〈鱷魚文〉開篇便提出先王及後王之別，「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擗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⁵³先王應指三代聖王，當時天下太平，潮州並無鱷患；然而後王德薄，不能再治理潮州，於是鱷魚於此涵淹孕育，遂成禍患。韓愈以先王、後王作為比較，指出潮州鱷患全肇因於後王德行衰落，無法管理所致，很明顯，韓愈的態度是儒者一貫秉持的三代以上德盛與三代以下德衰的思維。然而唐代亦在三代之下的範圍內，如此一來，憲宗豈非屬於

⁵² [唐]韓愈撰，[清]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頁185-186。

⁵³ 同前註，頁330。

德薄後王之列，於是韓愈話鋒一轉，指出憲宗是唯一不同於後王的統治者，「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⁵⁴韓愈於此確實極盡諛帝之能，他稱憲宗所領土地遠達四海之外，並以禹跡為近，相形之下，憲宗比三代聖王有過之而無不及。〈潮州刺史謝上表〉中認為憲宗承大亂之後，竟能再現中興，實宜東巡泰山，行封禪告天大典，那麼，〈鱷魚文〉再次稱頌憲宗所統領境土之廣大，正與〈潮州刺史謝上表〉所稱憲宗「巍巍之治功」相呼應。

〈鱷魚文〉共有五處提到天子，分別為「今天子嗣唐位」、「刺史受天子命」、「承天子命以來為吏」、「以避天子之命吏」、「傲天子之命吏」，整篇文章幾乎隨處充斥帝王的影子。韓愈貶潮為罪人身分，而討伐鱷魚乃州縣刺史為民除患的行為，主祭者為韓愈，目的在於討伐鱷魚，但韓愈卻一直把遠在京師的天子憲宗皇帝納入筆端，他的用意著實耐人尋味，吳楚材（1655-？）、吳調侯評注此文便云：

全篇只是不許鱷魚雜處此土，處處提出「天子」二字、「刺史」二字壓服他。如問罪之師，正堂堂之陣，能令反側子心寒膽慄。⁵⁵

清人過珙《古文評註全集》亦云：

全在提「天子」二字，壓倒在前，然後轉入刺史，正面處處明是奉天討罪，何等義正詞辭。中幅勸勉一番，令其從容悔過。鱷魚雖冥頑，不得不俛首遠退矣。然非平日實有一片忠愛心腸，可以

⁵⁴ 同前註。

⁵⁵ 〔清〕吳楚材、吳調侯選：《古文觀止》（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8，頁382。

通諸天地鬼神，雖有此篇妙文，未必感格乃爾。⁵⁶

這些評論皆過於迂曲，討伐鱷魚與反側子何干？韓愈此時為謫臣，若真有意諷刺藩鎮，位子不對，時機也不對；而以為鱷魚在韓愈義正詞辭的訓告之下，必然會從容悔過，俛首遠退，更是令人啼笑皆非。事實上，若將〈鱷魚文〉與〈潮州刺史謝上表〉一併觀照，並從韓愈祈求恩赦的心理來看，兩文實有許多相應之處，〈潮州刺史謝上表〉云：

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疏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⁵⁷

〈鱷魚文〉則云：

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⁵⁸

韓愈兩文均頌揚憲宗所領土地極為廣闊，而韓愈乃受天子之命治理潮州，因此刺史便代表天子，與刺史抗衡便是與天子抗衡，處處抬高天子的地位，其實便是一種奉承技倆。然〈潮州刺史謝上表〉雖極盡誇讚之

⁵⁶ 吳文治編：《韓愈資料彙編》，頁 1161。

⁵⁷ [唐]韓愈撰，[清]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357。

⁵⁸ 同前註，頁 330。

能，但這畢竟是正面與憲宗溝通的文字，就憲宗而言，訊息的來源為正受處罰的犯錯者，那麼憲宗很可能會懷疑韓愈是否僅是爲了脫罪而說出違心恭維的諛辭。韓愈大概也顧慮到〈潮州刺史謝上表〉有可能會帶來這種反面效果，於是除謝上表外，必須再增添某些因素令憲宗得以證實〈潮州刺史謝上表〉言論的真實性，因此韓愈設計再由〈鱷魚文〉的側面傳播效果，加強憲宗在〈潮州刺史謝上表〉中所得韓愈忠愛君王的訊息。〈鱷魚文〉是行政首長行使職權的祭文，目標是地方上的蟲獸禍患，名義是爲民除害，除爲天子領土外，餘皆與帝王無關，因此，〈鱷魚文〉之所以處處強調天子的存在，其用意必須回歸〈潮州刺史謝上表〉的態度來觀照，這其實是一種間接側面的傳播。所謂側面傳播是利用人類心理的一項特質，當人們面對未必可信之對象當面訴說理由時，對其言辭內容往往會抱持懷疑態度，但當事人若是由側面管道得知此對象的批評時，多數會傾向於採取接受其說。因此，韓愈在〈鱷魚文〉中大力稱頌憲宗，是可以令憲宗省去當事人暗藏企圖的疑慮，並得以由此確認韓愈心中確實抱持崇敬帝王的態度，讓憲宗得以印證〈潮州刺史謝上表〉中的恭維之語。

然而，問題在於〈鱷魚文〉是地方性的祭文，並非直呈帝王的奏表，又如何保證能夠傳達給憲宗閱讀？訊息的流傳既然斷絕了直接的傳遞管道，那麼便只能透過側面傳播的形式，讓憲宗自己閱讀此文，故韓愈的首要工作是必須盡量提高此文能夠廣爲流傳的可能性，也由於此，他選擇以游戲筆法寫作〈鱷魚文〉。韓愈乃一代文宗，他除宣傳儒學，排擊佛老的傳道文章外，更有一類「駁雜無實」的游戲文字，這類文章在當時亦引起相當大的迴響。如韓愈在元和初寫作〈毛穎傳〉時，便曾因其意圖不明而廣爲世人傳覽，柳宗元（773-819）〈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便云：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

不能舉其詞，獨大笑以為怪。⁵⁹

〈毛穎傳〉因風格內容過於奇特，引來時人的注意，甚至連遠在柳州的柳宗元都聽聞，可見傳播力量之強大。那麼，韓愈在〈鱷魚文〉中將鱷魚人格化，並設計許多與鱷魚對話的場景，其實便是為了再現以文為戲的不協調效果，〈鱷魚文〉云：

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⁶⁰

寓諧於莊的遊戲筆法，描繪出一幅刺史韓愈與谿潭鱷魚談判的滑稽畫面，讓人讀之不免啞然失笑。而這一切的目的乃在於欲藉由怪奇遊戲的寫作風格而引起世人注意，進而傳播此文。雖然〈鱷魚文〉中混雜著不同的信息，但透過「選擇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的心理，不同的讀者會對於信息中被他所認同的部分特別注意，因此有人會注意到韓愈遺蟲魚以文的滑稽行爲，⁶¹有人則會注意到韓愈五提天子，不免歎氣，⁶²但韓愈的預設讀者其實應該仍是憲宗。韓愈此時方上表謝恩，進表的

⁵⁹ 〔唐〕柳宗元：《柳宗元集》（臺北：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卷21，頁569。

⁶⁰ 〔唐〕韓愈撰，〔清〕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頁331。

⁶¹ 釋契嵩云：「文者，聖人之所以待人者也，遺蟲魚以文，不亦賤乎人哉？」見〔宋〕釋契嵩：《鐔津集》，收入明復法師主編：《禪門逸書初編》（臺北：明文書局，1981年），卷19，頁203。

⁶² 林紓《韓柳文研究法·韓文研究法》云：「篇中凡五提天子之命，頗極鄭重，然在當時讀之，自見其忠，自後人觀之，不免有歎氣。」〔清〕林紓：《韓柳文研究法》，收入王水照主編：《歷代文話》，頁6474。

內容只有皇帝知道，或許憲宗正對韓愈的態度半信半疑，那麼再透過〈鱷魚文〉的側面讚揚，便可達到驗證的效果。由於〈鱷魚文〉並不是直接進呈皇帝的文章，那麼當憲宗由其他管道閱讀此文之後，他便不會懷疑這是否為韓愈刻意修飾，欲討好君主的言辭，而〈鱷魚文〉中一再推崇帝王的文字，此時便會與〈潮州刺史謝上表〉中恭維的內容造成一種重覆的效果，如此便可提高〈潮州刺史謝上表〉的言辭的真實度與可信度，讓憲宗在正面及側面，直接與間接雙向策略的交叉影響下提高被說服的可能性，進而相信並接受韓愈忠君的觀點，那麼，恩赦的機會便大大提升，而這也才是〈鱷魚文〉所欲達成的目標。

五、結 語

歷代對韓愈人格批評多集中在〈潮州刺史謝上表〉，但忽略了在韓愈保全性命的強烈思維之下，〈鱷魚文〉的寫作其實也是韓愈企圖影響憲宗的作品。本文自心理層面分析入手，重新建構韓愈貶潮時期重要文章的策略運用。而本文所謂策略，其實也就是如何呈現寫作意圖並達成目的的分析，寫作意圖只是一個基本動機，如韓愈懼死，冀望帝王恩赦是貶潮時期多數詩文的寫作動機，但如果只是單純於詩文中抒發這種心情，便沒有主動改變客觀環境的努力成分。但韓愈並非如此被動，他所考慮的是如何能夠讓祈望恩赦的意圖成功實行，這便涉及寫作策略的部分，也就是說：寫作動機是懼死，而獲赦則是目的，至於如何才能獲赦，便屬於策略運用的層面。而本文所聚焦處即是此策略部分，並透過以〈潮州刺史謝上表〉及〈鱷魚文〉為主軸考察，從而得出以下兩點結論：

第一、貶潮是韓愈從政途的第二次重大挫折，中年後的韓愈並不再如年青時傲氣，他對於死亡有極深的恐懼，從這個角度來看〈潮州刺史謝上表〉，韓愈的策略主要在於祈求生命的保全，並企望重返京師，因此謝上表中的內容雖表現出性格懦弱的一面，但這是對死亡的終極恐

懼，非凡人所能輕易超越，因此也不須苛責韓愈。而〈潮州刺史謝上表〉採正面溝通策略，以認錯、訴哀及建議封禪為方法，企圖使憲宗感受韓愈愛戴君王的誠意，從而實現其寄寓在文章中的恩赦意圖。

第二、〈潮州刺史謝上表〉畢竟是直接進呈憲宗的文書，韓愈以罪臣身分上書求恩，未必能真正得到憲宗的信任，於是韓愈設計〈鱷魚文〉，企圖藉由駁雜無實的怪奇風格，使此文得以傳誦，而目的則希望憲宗能閱讀此文。韓愈大概寄望利用側面宣傳的效果，利用心理特質，在〈鱷魚表〉中一再強調自己與天子的關係，進而傳達忠君愛國的形象。韓愈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藉由這種側面讚揚的效果，與〈潮州刺史謝上表〉呼應，透過重覆驗證，讓憲宗確認韓愈忠於帝王的用心，並得以由此獲得赦免機會。

從〈潮州刺史謝上表〉及〈鱷魚文〉的文章內容來看，分別代表韓愈對帝王歌頌及以文為戲的寫作現象與風格，這是韓愈在貶潮之前已基本具備的特色，並非貶潮之後才開始，但兩種風格現象卻在貶潮時期有了連結。韓愈貶潮時文章並不多，但大多數文章其實都圍繞頌揚天子的觀點之中，這些論述其實與韓愈深刻期盼早日獲赦以離開此瘴癘之地有極大關係；至於以文為戲的〈鱷魚文〉，經由本文分析之後，其目的亦是為了配合表面上對憲宗稱頌的文章而成，只是韓愈利用遊戲之筆的方式寫作〈鱷魚文〉，目的是為了讓〈鱷魚文〉可以有更大的機會廣泛傳播，最後直達目標讀者唐憲宗，故〈潮州刺史謝上表〉及〈鱷魚文〉分別代表韓愈由直接正面讚揚及間接側面稱頌的兩種溝通策略。而這兩種策略的結合，一方面不僅代表韓愈苦思經營的對貶潮困境的掙扎，另一方面卻也讓韓愈原本兩種不甚相關的風格現象有了結合，更加突顯出韓愈浮沈於名利官場的真實心境，對於韓文的研究，或有可裨補之處。

徵引文獻

(一)古籍

- 〔漢〕司馬遷：《史記》，《百衲本廿四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
- 〔唐〕元稹：《元稹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
- 〔唐〕柳宗元：《柳宗元集》，臺北：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
- 〔唐〕張籍：《張司業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 〔唐〕韓愈著：《韓昌黎全集》，上海：世界書局，1935。
- 〔唐〕韓愈撰，〔清〕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臺北：世界書局，1972。
-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百衲本廿四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 〔宋〕石介：《徂徠石先生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
-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
- 〔宋〕洪邁：《容齋隨筆·五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宋〕黃震：《黃氏日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 〔宋〕釋契嵩：《鐔津集》，收入明復法師主編：《禪門逸書初編》，臺北：明文書局，1981。
- 〔金〕王若虛：《滹南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 〔明〕茅坤編：《唐宋八大家文鈔評文》，收入王水照主編：《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 〔清〕何焯著，崔高維點校：《義門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
- 〔清〕吳楚材、吳調侯選：《古文觀止》，北京：中華書局，1962。
- 〔清〕林紓：《韓柳文研究法》，收入王水照主編：《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二)近人論著

- 王基倫：〈韓愈散文分期意義之探討〉，《漢學研究集刊》1，2005：49-66。
- 兵界勇：《唐代散文演變關鍵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博士論文，2005。

吳文治編：《韓愈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

陳振鵬、章培恆編：《古文鑒賞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1。

楊子怡：《韓愈刺潮與蘇軾寓惠比較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8。

閻琦：〈元和末年韓愈與佛教關係之探討〉，《蘇州鐵道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4.3，1997：46-52。

羅聯添編：《韓愈古文校注彙輯》，臺北：國立編譯館，2003。

Discussion of Two Writing Strategies When Han Yu Was Relegated to Chao-Chou

--Base on "Chao-Chou Ci Shi Xie Shang Biao" and "E Yu Wen"

Jiang, Long-xiang

(Received September 20, 2010 ; Accepted December 5, 2010)

Abstract

When Han Yu was delegated to Chao-Chou, part of his opinions on public affairs that flattered the emperor was denounced by other scholars seriously. To understand the real intention of Han Yu,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thinking of Han Yu, remorse and fear of death, through poetry respectively.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these two psychological factors, Han Yu thirsted for pardon and showed this feeling in his writings. As a result, based on this premis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two writing strategies of Han Yu when he was relegated to Chao-Chou. The first writing strategy was direct communication, Han Yu used documents such as "Chao-Chou Ci Shi Xie Shang Biao" to speak highly of Xian-Zong enthusiastically, admit his mistakes, and intercede. The second writing strategy was indirect propagation; Han Yu sent a punitive expedition to the crocodile to propagate his article extensively, and he also glorified the exploits of Xian-Zong in "E Yu Wen" to establish his loyal image towards the emperor, which echoed "Chao-Chou Ci Shi Xie Shang Biao". Han Yu tried to make Xian-Zong believe that his flattery opinions regarding his loyalty towards the emperor were his real feelings, so that he could be pardoned by Xian-Zong.

Keywords: Han Yu, "Chao-Chou Ci Shi Xie Shang Biao", "E Yu Wen", writing strategies